

第一章

官运亨通的韬略

张之洞由一名京城小官，一夜之间连升三级，一跃而为山西巡抚。从此之后，他一路攀升，终于入阁拜相，登上了封建臣子职务的最高峰。

张之洞一生都在做官，一生都在升官，一生都没有被贬过官，更没有丢过官，甚至连降级处分都极少，堪称官场奇迹。

那么，张之洞何以会如此呢？他又哪些官运亨通的韬略呢？

1. 抓住一切机会， 让权力中心赏识

官运亨通的人一定是会抓机会的人，抓什么样的机会？抓让权力中心赏识的机会。张之洞通过代写奏折、巧妙联对、上疏解围等方式，不经意处已深获最高权力中心的赏识，人们皆谈张之洞的运气，又有几人能知这其中蕴含了他多少苦心，多少韬略！

翻开中国历史，“借东风”、“借荆州”、“草船借箭”等跟借有关系的典故比比皆是。政治家以“借”谋高官；商家以“借”赚大钱，不借助外部的力量，试问谁是英雄？但借助外部力量，最好的选择莫过于依靠最高当权者了，可是这谈何容易。然而张之洞在这方面颇具谋略。他本来就凭非凡的才华崭露头角，又得到最高当权者——慈禧太后的赏识，于是一生仕途畅通无阻，官运亨通，手中的权力如芝麻开花节节高升。

张之洞的族兄张之万担任河南巡抚期间，张之洞由于第一次会试落第，正赋闲在家，于是张之万就邀请他来开封居住，一来好温习经史，二来也可帮衙门拟点文稿，借以历

练。张之洞代族兄起草了几份奏折都很得体，受到慈禧的嘉许。其中一道关于漕务的奏疏写得尤其好，受到朝廷赏识，两宫皇太后赞扬它言论切中时弊，在奏疏上亲批了“直陈漕弊，不避嫌怨，饬部施行”。张之万在此之前一直因自己两度做主考官，使得张之洞失去两次会试机会而不安，又恰逢张之洞乘机吐露心愿，于是，张之万在不久后的另一道折子里，顺便提到了漕务之折乃族弟张之洞所拟。就这样，身居深宫的慈禧太后知道了张之洞见识和文笔都不错。这些都不疑为他在以后仕途的发迹，做了一个极好的铺垫。

同治元年（1862年），有一次张之万陛见慈禧太后时，慈禧曾向他询问道：“你的堂弟之洞颇负才名，怎么至今还没有入翰林？”张之万奏陈是因为他做主考官，循例他应回避的缘故。慈禧听后点点头，就说：“本打算明年让你继续担任主考官，现在看来还是换一个人吧。”从这件事可知张之洞的才华在入仕之前，已经深得慈禧太后的赏识了。

1863年春，张之洞再一次入京会试。功夫不负有心人，结果，被录取为第141名。5天后，所有贡士在保和殿参加复试。这次张之洞发挥极佳，卷子上交阅卷大臣，被评为一等第一名。又过7天，进入殿试，这是封建社会最高级别的论才大典。这次张之洞获得二甲第一，即第四名。

按惯例，主考官将前十名进呈皇帝，由皇帝亲自圈定名次。通常皇帝都不作改动，按主考官所呈上的名次圈定。但刚刚垂帘听政的二十八岁的慈禧太后，却不是一般的执政者，她原本就恃强好胜，再加上正逢掌权之初，所以她非常想有所作为。青年时代的慈禧头脑明白，办事认真，办起事来很有一套自己的主张。和封建社会历代最高统治者一样，

她对科举也十分看重，这不仅仅是为了笼络读书人的心，也的确是希望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她仔细阅读了张之洞的应试策论，觉得他的考卷辞藻绝丽，语句酣畅，旁征博引，颇有史汉遗风，尤其是他有直指时弊的勇气，这是难能可贵的。慈禧太后对张之洞的才智十分欣赏。她又记起几个月前他代河南巡抚张之万所拟的关于漕务的奏疏，回想起张之万对他的介绍：十三岁进学、十六岁领解的经历和父死任上、族兄状元的家风，慈禧太后隐隐地觉得这道策论的主人，正是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于是便提笔将张之洞的名字由第四名勾到第三名，特擢之为二甲第三名，中探花，赐进士及第。张之洞与慈禧太后之间超乎寻常的君臣关系在此埋下了伏笔。不要轻看了这一个名次之差的改动，它的意义真可谓非比寻常。

原来，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二甲、三甲三等。二甲三名，俗称状元、榜眼、探花，又称该科鼎甲，琼林宴上，单独坐席位，用的是银碗玉箸。其他的进士则八人一桌，用的是瓷碗竹箸。出午门游金街后，众进士要送他们三人先回寓所后，才各自回到下榻处。不仅风光不同，出身有别，更重要的是实惠相差甚大。所有进士都想进入翰林院。翰林清华，迁升又快，最为士人所羡慕。二甲三名可免试直接进入翰林院，授修撰或编修之职，而三甲、三甲则要通过朝考后择优录取，三年后散馆再授编修或检讨之职，在年资上低了三年。这样，二甲三名所占的好处就大为超过三甲和三甲。

金榜张贴之后，欣喜万分的张之洞按惯例去主考府上谢恩，主考就把慈禧太后改动名次一事告诉了他。张之洞一听

慈禧太后如此恩眷自己，顿时有肝脑涂地无以为报之感。

又过了 3 天，在太和殿举行传胪之礼，张之洞被赐“进士及第”。次日，各位新科进士向帝后谢恩。殿试之后，还有一关，即朝考，也就是选拔庶吉士的考试。清沿明制，在翰林院中设庶常馆，选新进士入馆，为翰林院庶吉士，分习满、汉文书籍，称“馆选”。三年期满后举行考试，成绩优良者分别授以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其余分授各部主事等职，或以知县优先委用，称为“散馆”。

新科进士琼林宴选在慈禧太后生辰之日，这是她垂帘听政后的第二个生日，第一个生日时，她忙于幼主登基、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内除载垣、肃顺等一班跋扈悍臣，外剿太平天国等国家大事，所以生日草草而过。现在不同了，内患已平，国家大权在握，名义上是与慈安太后“同治”，实则一人专政，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因此，她在养心殿大摆寿宴，接受文武百官朝贺。

待文武百官贺寿拜礼毕后，由大主考和副大主考带状元、榜眼、探花等新进士上殿，行三跪九叩之大礼，既是贺寿，也是谢恩。太后颁旨向进士们赐金花后，大主考和副大主考正要带这班进士退下时，慈禧降旨：“翁状元、万榜眼、张探花留下，其余的下殿！”

这些人不由得心中一惊，不知西太后有何谕旨。在殿的文武大臣个个面面相觑，等待下文。此时，养心殿寂静无声，只见慈禧沉思了一会儿，说道：“翁状元、万榜眼、张探花，你们三位是朝廷新贵、天子门生，我有一副上联，请诸位对下联，属上好者，即为我太后门生，并立授官职。”

张之洞一听太后出联收门生，心中大喜，觉得这是平步

青云的大好机会，隐隐看到幸运之神向自己走来，一条宽大的官宦之路在面前延伸，只要自己跃过这副对联的栏杆，就能平步青云。十年寒窗、三更灯火，为的就是仕途大进。机遇拍门，岂可拒之门外？他暗暗告诫自己：一定要把握好这次机会。只听慈禧太后说道：“洛水灵龟献寿，天数五，地数五，五五还归二十五，数数定元始天尊，一诚有感。”

初听太后上联，乍觉容易对句，仔细推敲，又觉难度颇大，联中一连用了八个数字，且有相乘变化；内容包容天地，还紧扣寿辰之庆。要对得太后满意、百官喝彩，确非易事！之洞知道，机遇对他们鼎甲三名是均等的，但只能属于其中某一个人。如果自己把握不住，稍纵即逝，将是终生遗憾。于是，他强迫自己抛开一切可能干扰自己思维的想法，全身心地投入到西太后的上联中去，让思想的翅膀载着才华的慧眼去翱翔。上穷碧落苍穹，下视茫茫大地；心系浩瀚大海，情接巍峨高山；奇花异草，走兽飞禽……他暗暗呼号。幸运之神既至，灵感之神为何姗姗来迟呢？他偷眼觑了觑身边的翁状元和万榜眼，见他俩伏地不动，口中喃喃有声，如同道人祷告、和尚念经……

于是张之洞继续思考，他不经意地向旁边扫视了一眼，突然看到大殿旁边的一幅丹凤呈祥的巨幅丹青画，顿时灵感呼啸而至。他脱口而出：“丹山彩凤呈祥，雄声六，雌声六，六六总成三十六，声声祝慈禧太后，万寿无疆！”

张之洞一联既出，四座皆惊，满朝文武一片称颂。慈禧更是万分高兴，称张之洞是其得意门生，授职翰林院编修兼侍读。此后，张之洞声誉大起，步步高升，官位日崇。不久，太后钦定他为浙江乡试副主考。

“忠心耿耿”历来是为官的第一要义，也是官运亨通之秘诀，尤其在封建君主专制的古代社会，由于实行的是人治，所以忠君与报国、爱国成了同义词，“人存政举，人亡政息”。最高当权者衡量官员的最主要的标准，就是看他是否忠于自己。因此为官者要想升迁，不仅要最高当权之人怀有忠诚之心，而且要通过某种方式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最高掌权者或上司遇到困难的关键时候，要勇于挺身而出，给最高当权者留下深刻印象。这样才能得到当权者的赏识和重用，才能成就一番功业，这是为官者升迁的一条捷径。否则自己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扼腕长叹，报国无门，请纓无路；或者明珠暗投，结果不仅无功，反而受害，甚至遭致杀身之祸。例如才华横溢的孙臆被庞涓所妒，不得不逃往齐国；运筹帷幄的韩信在项羽帐下多年，始终不得重用，不得不北投刘邦等等，都证明了如果一个人不能得到最高当权者的信任、赏识，要想成功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张之洞在做京官清流的几年间，连连上疏言事，纠弹时政，在野朝上下获得显赫名声。这除了因为他的政论表达了一般士大夫维护封建纲纪和国家民族尊严的意愿之外，还由于在他慷慨陈词的外壳下，隐藏着善于机变的内核。除了较少直接弹劾朝廷枢要之外，他还颇能揣摩以慈禧为首的最高统治者的脾味，除了时时凸现出对慈禧太后的忠诚外，还特别注意在直言清议之际决不固执一端。这是他不同于其他清流人士之处。他的奏议善于巧妙迎合慈禧的心理，他在京师列于“清流派”之间时，就有人说他精通为官之道，后来的飞黄腾达，更是得自慈禧的恩宠器重。特别是由山西巡抚擢升两广总督，则完全是慈禧的格外重用。张之洞内心始终怀

有一种对慈禧感恩不尽的感情，因为他人苑翰林时，就有慈禧的知遇因素在内。后来仕宦得意，也离不开慈禧的垂青。因此，他论政时从不开罪于当时政坛最高实权人物慈禧。慈禧在弥留之际，密召张之洞入大内，谕以“立宣统为光绪嗣，以其父为摄政王”之大政。张之洞在谢世前，还常常感叹：慈禧太后对他的恩宠，比宋代宣仁皇后对苏轼的赏识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可知，在张之洞头脑中，有一种“后党”潜意识，这是他每临大事时的一个指示器，也是他步步高升的奥秘之一。

张之洞早年为京官之时，既不能以军功而显，也不能以理政见长，要崭露头角，引起当政者的注意，惟一的方法就是上疏。

张之洞在“为同治皇帝立嗣”的风波中，挺身而出，上疏为慈禧辩护解围，赢得慈禧的格外垂青，从而奠定了他升官的基石。这在光绪初年的继嗣继统之争中，表现得格外明显。

1875年，19岁的同治皇帝病死，围绕着皇位的继承问题，朝廷掀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同治皇帝没有儿子，由谁来继承皇位就成了问题。按清王朝的祖宗家法，皇帝死后无子，应从皇族近支的晚辈中选一人立为嗣帝，继承皇位。同治皇帝是载字辈，晚辈则是溥字辈。王公大臣一般认为道光皇帝长子奕纬长孙溥伦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因为同治皇帝是道光皇帝的嫡孙，所以立溥伦既可为同治帝的嗣子，又合乎“继序之正”的家法。但是慈禧太后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最高权力地位，坚决反对立溥字辈的人继承皇位。因为溥字辈的人一旦继承了皇位，慈禧太后作为皇帝的祖母，便会

晋尊为太皇太后，那么其地位必定是虽然尊贵但是毫无实惠可言，并且按清朝祖制，太皇太后不能垂帘听政。这当然是权力欲极强的慈禧太后所不愿看到的一幕了。相传其时同治皇后已有身孕，如若生子（即慈禧的孙子）便有继位资格，如果出现此种事态，慈禧便要离开“听政”位置，故慈禧百般折磨皇后，使其绝食而死。

紧接着慈禧从自己的权力考虑，不顾违背清王朝皇位继承“以子传子”的祖宗家法，决定立醇亲王奕譞的儿子载湉为咸丰继子继承皇位，称嗣皇帝，即光绪帝。在皇室近支中只有载湉和慈禧的关系最亲，他的父亲醇亲王奕譞是咸丰皇帝的弟弟，而他的母亲则是慈禧的亲妹妹，更为重要的是载湉当时只有四岁，慈禧将有充分的理由以太后的身份继续垂帘听政。本来，在载字辈的皇室近支中，奕?的长子载灃也是一个最有资格继承帝位的人选，但由于他已经十七岁，到了可以亲政的年龄，这不利于慈禧继续揽权，加上慈禧和奕?有矛盾，载灃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慈禧作为继承帝位的人选。

在宣布立载湉为帝的御前会议上，慈禧首先提出太后垂帘听政，与会大臣并无一人表示异议，仅有人提出“以宗社为重，请择贤而立”，然后再行垂帘听政。慈禧并不理会，便当场宣布立载湉为帝。众大臣都顺从地退回军机处拟旨。于是朝廷以两宫太后的名义宣布：“载湉承继文宗显皇帝（咸丰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紧接着在太和殿为载湉举行了登基大典，这就是光绪皇帝。两宫太后以新皇帝年幼为由，再次宣布垂帘听政，实际上大权主要操于慈禧一人手

中。

慈禧太后的这些做法既违反中国传统又不符清廷家法，在朝廷内部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朝野士民议论哗然。但是慈禧敢于在皇帝继位的问题上，不顾祖宗家法，作出这种“枉国法，犯舆论”的行为，说明她自祺祥政变后十余年的垂帘听政，已经把朝廷大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了，因此对这位高高在上的西太后的所作所为，绝大多数人是不敢公开表示反对的，但有些人却采取了其他曲折的方式来表示抗议和不满，私下里议论纷纷。这自然成为权力欲极大的慈禧的一块心病。比如当时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便上奏请求召开王公大臣会议，他表示对朝廷“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同治帝）为嗣”这一承诺，必须当众“立铁卷”，他试图以王朝最高的“立法”来防止日后有变。其实慈禧太后原本发布的“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的懿旨，只不过是一种缓兵之计罢了，并没有什么诚意，她只是想以此为借口，赶快平息这场立嗣风波。所以广安的这次“较真”引起了她极大的不快，她马上传旨严加申饬。

同治帝死后不到一百天，同治帝皇后又自杀身亡，这显然也和慈禧的迫害有关。御史潘敦俨借此奏请对同治帝皇后赐以美谥，加以“表扬”，这一举动无疑是向慈禧施加压力，当然也同样遭到慈禧的申饬，下令给潘以“夺职”的处分。

到 1879 年为同治帝及其皇后举行“人葬”之时，两宫皇太后与小皇帝载湉亲临主持这位大行皇帝的奉安大典，诸王大臣及文武百官扈行送葬。葬礼举行完以后，吏部主事吴可读为请求给同治帝立嗣，竟然在蓟州车马神桥三义庙留下

遗折一道后服毒身亡，实行“尸谏”，于是再次掀起了继续继嗣风波。吴可读遗折的主要内容便是乞请两宫皇太后明降谕旨，为同治帝立嗣。吴可读认为：“大清朝廷二百多年来，祖宗家法，都是子以传子，这是万世不变的规矩。现在两宫皇太后却立咸丰帝之嗣为嗣，中外及左右大臣虽然多次进谏，提出异议，但是两宫皇太后拒不纳谏，大家对此极为不满，议论纷纷，希望两宫皇太后不要一误再误，要及时改正不妥当的做法，以杜绝大家的议论。”

吴可读这次“尸谏”震动了朝野，慈禧被置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她最担心的莫过于有人会提出同治帝载淳驾崩后所立嗣当为载淳之嗣、而非咸丰帝之嗣的问题，更担心有人会借此发难，而危及自己的统治权威，于是她便召集御前会议，发动王公大臣解围，她发布懿旨称：吴可读遗折内容，与以前两宫皇太后发布的“嗣后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的懿旨，意见相同。慈禧太后企图强使大家承认既成事实，她还命令六部九卿“将吴可读原折会同妥议具奏”。当时朝廷内外反响强烈，不少大臣虽然担心参议不当，反受其累，多不敢发表意见，但内心却颇有异见，一时造成“内阁集议各执一说”的局面，这显然对慈禧十分不利。

在慈禧碰到这个棘手难题的关键时刻，张之洞想到：自己成就功名，西太后有眷顾提拔之恩；现在慈禧太后的做法固然引起了非议，但其大权在握，事实已成，死了一个吴可读，决不可能改变慈禧在清廷的最高权力地位，当今皇帝年幼，西太后执权柄之日方长。最后，张之洞决定挺身为西太后立载湉之举辩护。

他在 5 月 30 日上疏，为慈禧解围。张之洞递上一折一片，指出“请明降懿旨，将来缙承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意思是说：光绪将来生了儿子，应作同治的嗣子。这无疑只是重申慈禧原有的说法，接着他在奏疏中进一步为慈禧辩解道：西太后的所作所为“出于两宫皇太后之意，合乎天下臣民之心，而为皇上所深愿”，进而说明“继统继嗣本无区别”，现在虽然没有确定由何人承嗣同治帝，但将来承继光绪皇位的人，也就是承继同治帝为嗣，吴可读的请求多此一举，完全是不必要的。太后的做法自然是“本乎圣意，合乎家法”的。这样，张之洞通过在继嗣继统这件事上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力排众议，维护了慈禧的利益，巩固了慈禧在光绪一朝的太后地位，从而也就肯定了慈禧掌权的合法性。张之洞的这一举动大大讨得了慈禧的“恩宠眷顾”，给慈禧留下了深刻印象。西太后读到张之洞的折子，感到十分满意，当即发布懿旨说，皇帝将来诞生皇子，其继大统者，为穆宗毅皇帝嗣子。所有吴可读原奏及王公大臣会议折并谕旨，均各录一份存毓庆宫。

张之洞在上疏中还表示，大家应根据国情，多提一些有利于国家发展的意见或建议，不要拘泥于一些既成事实或无关痛痒的问题中，一切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不要给个别迂腐者或奸佞者以可乘之机。

张之洞的辩解，显示了一种务实的政治风格，即以维护朝政的稳定为目的，避免因立嗣风波引起政局的动荡，所以这篇上疏在当时引起了较大反响。正如有人评论的：“自是以来，京朝风气王然，士大夫始知朴实之可宝，一扫咸同以来拘虚空疏之习。此文襄之学问，有以牢笼于一世，而卓然

开风气之先者也。”

当时虽然工部尚书翁同龢、刑部尚书潘祖荫、协办大学士徐桐等官员，也联衔上奏，表示了对慈禧太后的支持，但他们的辩护都不如张之洞的奏章论述得全面有力。

关键时刻张之洞挺身而出，上疏为慈禧辩解，使难题迎刃而解，从而得到慈禧极大的好感和信任，这既为自己今后迅速升迁作好了铺垫，又使清流党阵营的发展有了一定的保障。张之洞后来又上奏了几个在清廷中引起强烈震动的案子，所议多为清廷采纳。例如张之洞于 1880 年 1 月上《详筹边计折》，提出筹边之法为练兵、筹饷、用人。在疏中，张之洞一方面尖锐批评了近年讲求洋务成效甚微；另一方面又批评自持高论的士大夫迂腐无用；他既强调修德修政而表现出清流本色，又主张练兵筹饷而显示务实的风格。这使他既不同于重功利的某些洋务官员，也不同于重义理的某些清流人士，而表现出自己的独特政治风格。由于他的这些具有很多合理性的奏疏大都被采纳，从而对推动当时社会的发展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张之洞为慈禧太后进行辩解的上疏。

同时，慈禧太后也没有忘记张之洞，她对张之洞恩宠有加，几乎是一夜之间让他连升三级，由京城小官一跃而为山西巡抚。其晋升速度之快，为时人所侧目。张之洞终于“以谏书为捷径”抓住了机会，获得了权力中心的赏识，从而迈进了封疆大吏的门槛。

综观张之洞在翰林时期的言行，作为一位清流名士，他似乎显得有些“宦术甚工”；作为一位晚清政治家，他又具备了某种成熟的素质。19 世纪后期，当洋务派屡屡误国受

挫而颇受舆论抨击，清流人士高谈阔论而又得罪权贵终遭打击时，张之洞的这种政治风格便能独树一帜，从而在晚清政坛上迅速崛起。

在维新变法期间，朝廷中出现了两派，一派是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主张立刻实行变法；一派是以慈禧为首的“后党”，反对变法。张之洞虽然不论是在两广总督任上，还是在湖广总督任上时，都大办洋务事业，推行新政，但他看到朝中的实权实际上一直牢牢掌握在慈禧手里时，所以还是明显偏向于慈禧，并通过撰写《劝学篇》及时与维新派脱离了干系。这样当戊戌变法被镇压下去，慈禧重新主政时，张之洞依然得到重用。

在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时，张之洞更是特别表现出全力维护慈禧太后地位的态度。还在慈禧出逃之前，1900年7月24日，他约同李鸿章、刘坤一联名致电上海总领事，请求严禁上海、香港及南洋各埠报馆刊登攻击慈禧太后的言论，声称，若不禁则“人心惶惑，致生种种事变，不利于中国，兼不利于各国。”并为慈禧太后进行辩护，希望各国维护太后的声誉：“我皇太后训政三十余年，素多善政，尤重邦交，岂有袒匪之理，不辩自明。朝廷种种为难情形，各国未有深悉耳。我中国以孝治天下，臣民共戴两宫，无稍异视。不特臣民尊敬皇太后亦如英人尊其后，皇上又加有母子之恩，尤极尊敬皇太后。我皇太后之心不安，则我皇上之心亦无以自安。现东南各省极力弹压，遵旨保护洋人。然假使各国不尊敬我皇太后、皇上，四海臣民必然不服，以后事机实难逆料。”

当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张之洞致电上海各国总领事，

要求立刻停攻北京，不要惊动了太后及皇上。当慈禧太后逃往西安后，他还专门选择慈禧喜爱的陕西又没有的物品，陆续由湖北送往西安。10月5日，他在会见英国驻汉口代总领事法磊斯时，恳切地保证说，“慈禧太后对于北方所执行的敌对政策感到懊悔，而且将对其首要分子施行惩罚”。同时，又为慈禧作了“冗长的辩护”。他说：“太后由于她在1860年的行动以及在镇压各地叛乱方面获得的胜利；从而有功于本国和列强。她在掌权的三十年间，从来没有对外国人或外国事物表现出任何敌意。事实上，她在自己的宫廷中欢迎外国新发明的东西，并且试图与外国妇女结成友好的关系。1889年她自动隐退一事，证明她对权力并非恋恋不舍，如果不是康有为及其同党以保护皇帝为借口谋害她的生命，她绝不会从隐退中重新出山。于是她对‘维新人士’抱有偏见，开始不信任外国人；由于康党要求外国应允给予支持，而这些要求显然获得了报纸（特别是上海报纸）的赞成，所以使她大受影响。报纸上经常声明对中国的瓜分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迫在眉睫，这同样使她感到惊慌；由于各国对胶州湾、旅顺口、威海卫、广州湾的占领以及意大利对三门湾的要求，从而证实了这些声明。因此，她站在保守派那一边，并且对端王、徐桐、刚毅等三个阴谋家言听计从。”

法磊斯提醒张之洞说：“太后作为国家元首，必须对任用坏人承担责任”。张之洞“承认她犯了错误”，但又对法磊斯说：“由于皇帝是太后陛下的嗣子，而且由于中国的政治依赖孝顺的原则，如果皇帝容许他的母亲遭受耻辱，那么，他就无面目见他的臣民并获得他们的忠顺。”法磊斯听了张之洞的辩护之后，认为张之洞的论点“完全符合中国人

的感情；同时，因为中国的知识阶层比任何其他阶层的人对总督大概更为尊敬，所以他的意见是很受重视的。如同他本人所说的那样，在中国，‘面子’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即使皇帝也不能做任何动摇群众的信念和成见的事。”由此看来，张之洞竭力维护慈禧的“面子”，还有维护传统伦理道德的一面。

张之洞一生竭力向慈禧表达自己的忠诚，实际上体现了他的政治远见。因为慈禧在晚清一直掌握着实权，得到慈禧的赏识，实际上就等于拿到了仕途升迁的钥匙。否则，如果跟错了人，选择了没有发展前途的执政者，那么即使再忠心耿耿都无济于事，就像光绪的老师翁同龢不仅被罢官，而且差点银铛入狱，终于抑郁而死。